

左金隆◎著

新旧制度经济学

制度变迁理论之方法研究

XINJIU ZHIDU JINGJIXUE
ZHIDU BIANQIAN LILUN ZHI
FANGFA YANJIU



科学出版社

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之方法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的三层次比较与评析

左金隆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基于当前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 经济发展亟须全方位、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而国内经济学界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相对短缺的背景下, 本书立足于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点, 以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为对象,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 通过“基础层次——经济学技术方法、扩展层次——跨学科综合方法、最高层次——哲学思维方法”三层次的比较与评析, 系统探讨它们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在此基础上, 本书尝试为国内学界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提供少许可借鉴的思想。

本书可作为国内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人员、教师和学习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专业课程的学生的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之方法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的三层次比较与评析/左金隆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03-042875-2

I. ①新… II. ①左…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8464 号

责任编辑: 杨 岭 孟 锐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余少力 /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成都创新包装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25

字数: 230 000

定价: 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从作者的博士论文答辩时间算起，至今日该书得以出版，已有八年时间。细细读来，当年的博士论文仍有不少可取之处，这也是其出版价值之所在。

左金隆博士 2002 年秋考入我们门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虽然他在郑州大学攻读了三年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但由于他本科并未修习经济学相关专业，因此，其经济学基础仍需进一步加强与巩固。于是，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要求他除完成校方开设的博士生日常课程之外，还需重点加强自身经济学修养，广泛阅读经济学名著和相关专业书籍，经常学习时下国内外经济学权威期刊上面的优秀论文以求加深其对经济学的理解和认识。他依言而行，在学校攻读学位的四年中，的确读了不少经济学专业书籍，学习了不少科研论文，自身的经济学素养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对于做学问也初窥门径。

入校一年之后，在确定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时，考虑到他以前的非专业出身，我建议他选择一个稍微容易点的题目以便为博士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他告诉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对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特别感兴趣。他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激烈转型期，也正是各种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一些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正在构建的时期，研究制度变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为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参考价值。在中国研究制度变迁，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学界研究也不少，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切入点，这是值得思索的。经过几次沟通，他提出是否可以以研究方法入手去对比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方面的异同点，并借此了解当前国内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与国外相比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有何差距。听了 he 这个想法之后，我想，这的确是一条路子，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个领域历来都是经济哲学或经济学大家研究的“禁脔”，对一个后生晚辈，学术新人而言，难度颇大，我不禁为他捏了几把汗。另外，新旧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对比，国内学界也有研究，他将要开展的是博士毕业论文研究，这方面又该如何推进呢？我提出了上述疑问。我给他建议，可以考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平台上展开二者的对比，这也可以使得二者的对比有一个科学的评判标准。此外，从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的价值和篇幅来说，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对比可以展开几个层次，国内学界目前的对比主要体现为小论文的形式，稍显单薄，而且，层次性也比较缺乏。未来的博士毕业论文可以在深度上多挖掘一下。

写作过程中，就一些具体问题，我跟他也多次展开探讨，指导他如何去解决

那些问题。经过多次修改，他的毕业论文基本定稿，该书就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形成的。从当前的结构来看，作者对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对比分成了三个层次，分别是，基础层次——经济学技术方法、扩展层次——跨学科综合方法、最高层次——哲学思维方法。与国内学界的现有研究相比，作者注意到了跨学科方法这个独特的维度，而且，把它很好地整合到了整个研究体系中，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探索。从逻辑的体系上说，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者首先使用的方法肯定是学科内的技术方法，这是基础层面，在此之上，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有些大家便把目光投向了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心理学、法学等。自然而然地，他们引入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最后，任何方法背后都会体现一定的哲学思想，这是研究方法的最高层次。因此，三个层次的划分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并不是单纯为了凑数量。这些方法的使用是否存在着科学与不科学之处？或者说这些方法本身是不是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可以为之提供一个评判。这也是作者选择这一平台的学理所在。事先让我担心的两个层次——跨学科综合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较有成果的。从当前的书稿看来，作者在写作期间通过大量阅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两方面的欠缺。在该书的最后章节，是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还尝试性地利用自己的研究结论去剖析了2005年以及2013年国内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得出了一些较有见地的见解。

当然，由于作者本身并非经济哲学专业的博士，在研究方法这个领域的探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勇于尝试的精神值得鼓励。未来研究的路还很长，希望左金隆博士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取得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总之，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可以为当前学术界在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比较方面提供一些借鉴，也为后人继续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提供有所裨益的参考。

洪远朋

2014年9月

前 言

在中国经济发展亟须全方位、多方面的制度创新而国内经济学界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本书立足于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点，以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为对象，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三层次的比较与评析，系统探讨它们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在此基础上，本书尝试为国内的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提供少许可借鉴的思想，以期对当前改革的深入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全书共分为六章。简述如下。

第1章，导论。该章首先说明选题背景和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研究之重要价值，然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做综述，接着阐述本书的研究思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的三层次比较与评析，最后简述本书的基本结构、创新和不足。

第2章，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概述。该章把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为凡勃伦传统与康芒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为初创时期与深入时期，且均按照历史与逻辑的两条线索加以概述。

第3章，基础层次：经济学技术方法之比较与评析。该章首先介绍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所应用的分析描述法、制度-技术二分法、参与观察法以及交易范畴分析等方法；其次，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所应用的经济人假设、标准技术手段（成本收益分析与供求均衡分析）、交易成本分析以及案例研究等方法进行介绍；最后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二者的经济学技术方法从三方面进行比较与评析。

第4章，扩展层次：跨学科综合方法之比较与评析。该章首先分别从生物学方法、法学方法、历史学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四个方面介绍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所应用的跨学科综合方法。然后，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二者的跨学科综合方法进行比较与评析。

第5章，最高层次：哲学思维方法之比较与评析。该章首先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理性主义与演进理性主义两对概念做界定。其次指出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选择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视角，但凡勃伦传统与康芒斯传统分别坚持了演进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立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选择了方法论个体主义视角，但其研究立场却随其理论发展而经历了从建构理性主义到演进理性主义的转变。最后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二者的哲学

思维方法进行了比较与评析。

第6章，总论：继承、创新与启示。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而且，二者所应用的众多研究方法中某些方面值得借鉴，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国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现状。

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在以下三方面尝试性地做了一些的探索。

首先，研究视角的选择。本书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展开基础层次——经济学技术方法、扩展层次——跨学科综合方法、最高层次——哲学思维方法这三层次的比较与评析。

其次，比较与评析的论证。第一，分析描述法、参与观察法以及案例研究方法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此外，凡勃伦的本能学说与诺斯采用的经济人假设，以及康芒斯的交易范畴分析与诺斯的交易成本分析互有异同、片面性及科学性。第二，生物学方法和法学方法在诺斯与康芒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体现各有特色。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跨学科综合方法都使用了暗喻、类比以及某学科研究方法借鉴的形式但应用各个学科方法不同。第三，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立场随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从建构理性主义到演进理性主义的转变。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立场之间既部分一致又相互冲突。第四，除唯物史观的继承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外，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之间的继承还表现为：分析描述法、参与观察法、案例研究法都以描述法为核心；二者跨学科综合方法的应用形式都是暗喻、类比与研究方法借鉴。创新还表现为二者在使用各个学科方法上有所发展。

最后，研究成果的启示。就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而言，除成本收益分析和案例研究外，参与观察法也值得借鉴。此外，本书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2005年间以及2013年间国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现状分析之后指出，目前国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还需进一步多元化。

当然，本书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评析时，由于作者对其理解还不够深刻，所以，书中有些地方还有意犹未尽之感。另外，由于作者本身专业所限和时间因素的关系，使得本书对于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综合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这两个层面的比较与评析还不够全面、深入。这些不足之处需要在后续研究中积极补充其他学科知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加以完善。

左金隆

2014年8月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1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3
1.2.1 国内文献综述	3
1.2.2 国外文献综述	9
1.2.3 简评	13
1.3 研究思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的三层次比较与评析	15
1.4 基本结构、创新与不足	23
1.4.1 基本结构	23
1.4.2 创新与不足	26
第 2 章 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30
2.1 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30
2.1.1 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30
2.1.2 康芒斯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37
2.2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41
2.2.1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初创时期	42
2.2.2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深入时期	46
第 3 章 基础层次：经济学技术方法之比较与评析	54
3.1 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经济学技术方法	54
3.1.1 凡勃伦传统的分析描述法	54
3.1.2 凡勃伦传统的制度-技术二分法	56
3.1.3 康芒斯传统的参与观察法	59
3.1.4 康芒斯传统的交易范畴分析	61
3.2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经济学技术方法	63
3.2.1 前期继承与后期修正的经济人假设	65
3.2.2 标准技术手段——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均衡分析	70
3.2.3 交易成本分析	72
3.2.4 案例研究	73

3.3 比较与评析	76
3.3.1 从分析描述法、参与观察法到案例研究: 描述工具的继承与发展	76
3.3.2 从制度-技术二分法到经济人假设及标准技术手段: 研究范式的转换	81
3.3.3 从交易范畴分析到交易成本分析: 分析方法的替代	86
第4章 扩展层次: 跨学科综合方法之比较与评析	93
4.1 生物学方法: 进化论的引入	93
4.1.1 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自然选择思想	95
4.1.2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的间断性均衡与获得性遗传思想	97
4.2 法学方法: 英美法系理论的体现	99
4.2.1 旧制度经济学: 法官造法与“合理价值”	100
4.2.2 新制度经济学: 习惯法演变与制度变迁	105
4.3 历史学方法: 方法借鉴与历史案例	105
4.3.1 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对历史描述法的借鉴	106
4.3.2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关于历史案例的研究	106
4.4 心理学方法: 不同学派的应用	107
4.4.1 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心理学应用	107
4.4.2 认知心理学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应用	111
4.5 比较与评析	114
4.5.1 跨学科综合方法的普遍性: 暗喻、类比与方法借鉴	114
4.5.2 跨学科具体应用的特殊性: 各学科具体方法的辨析	117
第5章 最高层次: 哲学思维方法之比较与评析	121
5.1 有关概念的界定	121
5.1.1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概念的界定	121
5.1.2 建构理性主义与演进理性主义概念的界定	123
5.2 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哲学思维方法	125
5.2.1 凡勃伦传统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与演进理性主义立场	125
5.2.2 康芒斯传统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与建构理性主义立场	128
5.3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哲学思维方法	131
5.3.1 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视角	131
5.3.2 从建构理性主义到演进理性主义立场的转变	133
5.4 比较与评析	137
5.4.1 从方法论整体主义到方法论个体主义: 切入视角转换与各自缺陷	138
5.4.2 演进与建构理性主义立场的并列与转变: 部分一致与冲突	141

第 6 章 总论：继承、创新与启示·····	146
6.1 继承·····	146
6.2 创新·····	147
6.3 启示·····	149
参考文献·····	157
后记·····	169

第 1 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当今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据统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多年保持在百分之九左右。这种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大幅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什么会有“中国奇迹”的发生?这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制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正是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造就了“中国奇迹”的发生。然而,制度创新何以发生,有何特点?创新绩效如何评价?各地创新模式是否相同,可否推而广之?诸多问题都需进行研究。专门探讨制度创新问题的制度变迁理论无疑就是一种有力的应对武器。所以,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浏览有关文献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著述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不过,在这些研究当中,多数集中于制度变迁理论本身。对于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灵魂的研究方法分析却为数不多,一直处于比较“冷”的局面。为此,本书试图通过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的研究,来获取一些只关注理论本身的那些研究难以发掘的东西。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分析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析居于经济学核心的位置。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析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正是把经济学融为一体的科学和艺术。它的目标是,既要扩展我们的认识,也要使我们的认识更贴近于现实世界。研究方法论并非处于经济学研究基本层次的边缘,而恰恰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埃思里奇, 2002)“从古希腊到现当代,经济学家一贯重视对方法论的探讨与运用,经济学方法论始终没有放弃探索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张华荣, 2008)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作为经济学核心的研究方法创新,带来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比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当中提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其使用的总量分析方法视角独特,从而使得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高度,并因此成就了经济思想史上的“凯恩斯革命”。我们当然应该时刻关注经济学上的理论创新。但这绝对离不开经济学方法上的关注与研究。

其次,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对于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无论大到一门学科,还是小到一种理论来说,从其本身发展的过程来看,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指导作用。从制度变迁理论来讲,其研究方法一方面给既往理论的巩固完善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新理论的孕育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比如,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最初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把制度视为既定不变,在其理论体系中,没有制度分析的位置。这跟其研究方法中把人性假设为完全理性、信息假设为完全信息不无关系。这种人性假设与信息假设本身存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制度分析的既定化处理。然而,处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人们作出的经济行为不太一样。这就不得不对制度本身加以研究。为弥补这种缺陷,后人引入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完全假设对制度加以研究。由此,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开始得以创立。尔后又通过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的引入,不同的制度之间开始有了低效与高效的比较标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进行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研究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①具有重要价值。在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研究中坚持何种视角是值得慎重考虑的。可以选择从西方经济学视角出发进行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研究,也可以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进行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研究。但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进行研究更有价值。“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是我们观察经济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科学视角,尤其是它所应用的核心方法——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出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目的,这也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在对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研究过程中,对其科学性和片面性作出正确判断,对于值得肯定的方法要加以借鉴,对于不足之处需要在应用之中注意避免。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分析探讨同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当前,中国的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入,西部大开发、东北复兴的经济发展战略正在持续实施,中部崛起业已正式步入经济发展轨道,东部经济发展仍在进一步深化。在当前的改革深化过程中,逐渐暴露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需要得到解决,经济利益的调整势在必行,社会的和谐化发展是当前改革的导向,各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因此,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分析当前经济现实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辨清制度变迁理论当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免在应用理论指导实践

① 这里作者意指在充分挖掘、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中所蕴藏的丰富制度变迁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之内,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那些经典思想加以发展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时带来危害。因此,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来分析和借鉴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中有价值的精华思想,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在此基础上,应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改革提供指导,才能使改革更有效率地进行,经济更加科学地发展,中国梦更加容易实现。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通览作者搜集到的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制度变迁理论方法研究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专门研究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其二,专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其三,比较新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①的研究方法^②。本节的综述也按照这样的分类展开。

1.2.1 国内文献综述

第一,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专门研究。相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国内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献不是很多。目前理论界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凡勃伦二分法、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学方法,

①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涵盖范围说法众多。国内主流说法所指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人为首的一个学派,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产权学派以及新经济史学派这三个分支。对于旧制度经济学,公认是由凡勃伦、康芒斯与米歇尔三人创立的学派,但对于旧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等人的观点,有仍然称作是旧制度经济学的,也有称作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但后者不占主流。对于和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同属中期的艾尔斯(Clarence Ayres)、福斯特(J. Fagg Foster),以及一些当代学者,如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图尔(Mark R. Tool)、布什(Paul D. Bush)、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拉姆斯塔(Yngve Ramstad)和夏斯(Dennis J. Chasse)等人,由于国内关于他们的译著甚少,学界的关注度比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和缪尔达尔等少了许多。国外主流说法所指的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和国内一样,但也有说法扩而广之,把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也包括进来了。同时,还有把旧制度经济学上述诸位当代学者的观点称作是新制度经济学或新制度主义的,这主要是在旧制度经济学当代学者内部的说法,并未成为主流。而且,他们根据彼此具体观点继承的来源不同,分成了两大传统,分别是凡勃伦传统与康芒斯传统。凡勃伦传统主要包括创始人凡勃伦以及后来的艾尔斯、福斯特、图尔、布什等人;康芒斯传统主要包括创始人康芒斯以及后来的加尔布雷思、拉姆斯塔和夏斯等人。对于旧制度经济学,在国外旧制度经济学当代学者内部,他们指的是旧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以及中期诸位学者的观点。而整个经济学界主流说法指的是整个学派。由此可见,为了研究方便,需要对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涵盖范围作出界定。本书所指的新旧制度经济学与国内外主流说法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就专指诺斯等人创立的学说。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康芒斯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中,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凡勃伦的观点为主,还有布什等人的一些论述。康芒斯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康芒斯的观点。

② 国内外文献对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并未特别予以区分新旧制度经济学和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常常是二者混杂在一起的。这对旧制度经济学来说问题不大,因为旧制度经济学两大传统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制度变迁。但对新制度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学派与产权经济学派所用到的方法就不一定是制度变迁理论用到的了。这是需要注意的。

法学、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以及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演进理性主义。

在凡勃伦二分法方面，张林（2003，2004）对于凡勃伦二分法做了简要介绍。他认为，所谓二分法就是制度和技术，或者说工具和仪式的对立，它主要体现于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当中。在康芒斯传统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并没有明确体现。

在生物学进化论方面，魏建（2000）认为，生物学在凡勃伦的思想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凡勃伦坚持认为自己的进化论直接来源于达尔文，不同于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后达尔文主义者，强调进化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高级事物与低级事物之分。蒋道红（2002）对旧制度经济学的“习俗—惯例—制度化”变化机制作了生物学进化论方面的阐述。但他只是罗列了具体理论，在生物学进化论如何影响其理论方面的论述不很充分。

在社会学方法方面，薛艳丽（1995）对于社会学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她认为，首先，旧制度经济学主要受到了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思想的影响。帕累托关注非逻辑行动与经济活动制度背景的研究，为旧制度经济学解释制度形成和批驳传统经济学缺陷提供了路径分析的启迪。这对于凡勃伦的思想影响十分明显。其次，旧制度经济学还受到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方法影响。他们吸收和借用了社会学的系统论思想和整体主义方法，将经济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探讨社会各个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的部分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薛艳丽指出，这对于凡勃伦和康芒斯的研究方法都有所影响。凡勃伦坚决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那种把个人从社会和历史中抽象出来，以孤立个人的经济行为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演绎方法。他提倡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着重从社会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康芒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体现了整体主义方法，他将“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或“社会控制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核心，强调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以及政府法律对于私人企业活动的影响，从而将集体运行的运行规则和统治权贯穿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决策。很明显，薛艳丽的论述也涉及了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问题，不过，她主要是从社会学所应用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对其造成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谈的。

在法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鲁明学（1996）指出，凡勃伦等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本能心理学说为理论基础来研究人类行为习惯及其对社会各种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影响。程恩富和徐惠平（2004）指出，凡勃伦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制度，将制度定义为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思维习惯。康芒斯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他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组成的一种有机组织。由于参加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交易

过程中会有双方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只有依靠法律制度才能解决。康芒斯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制度变化所起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他的制度经济理论。他们也仅仅是简单指出这一结论而已,但社会心理学和法学方法到底是如何在凡勃伦和康芒斯的理论中应用的,并没有详细说明。而且,这种社会心理学是否属于行为主义,作者认为这还值得探讨。

在方法论整体主义方面,钱萍(2001)则直接从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入手,她认为旧制度经济学注重历史、传统和法律基础,坚持个体行为应从社会规则、习惯、习俗以及个体的社会地位之中演绎出来。因此,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采用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视角。旧制度经济学是在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论,也就是说将个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的基础上坚持整体主义的。她认为,这种方法论立足于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整体不等于其各个部分相加的总和,对经济系统的研究要注重其发展的历史、传统和法律基础;其二,整体影响和约束个体的行为和功能,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应从社会的规则、习惯、习俗以及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演绎出来。旧制度经济学家强调“整体主义并不是表明个体无价值,而是强调社会规则、道德准则以及文化对个体价值和个体理性的要求”。张林(2003)也指出了凡勃伦制度变迁理论使用了方法论整体主义。他认为,凡勃伦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制度变迁的整体性质,这使得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必然采用整体主义的方法。康芒斯传统是否也沿用了方法论整体主义视角,他没有提及。胡钧和刘凤义(2003)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的剖析,他们指出,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凡勃伦等人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基础上,将其系统化为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这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其实质仍然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因而不科学的。

在演进理性主义方面,张谊浩和陈柳钦(2004)在论述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时,非常简洁地仅用一句话指出了旧制度经济学凡勃伦制度变迁理论坚持了演进理性主义。但为什么作出如此结论?其演进理性主义的立场在其理论中是如何表现的,则语焉不详。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法的专门研究。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自引进以来,一直都是研究热点,关注其方法的研究性文章相对较多。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五类:其一,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批判与继承的角度加以分析;其二,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当中大量运用了案例研究方法;其三,着重讨论了生物学方法和认知心理学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影响;其四,在哲学方法层面,主要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五,综合上述四方面,采取综合的思想论及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

就第一类来说,富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只看到了继承的一面,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这种范式。吕中楼(1994)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人”范式,而其分支——制度变迁理论也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杨成长(1997)也曾对此做过研究,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归结为具体数量化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均衡分析法、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以及法律化方法^①。陈建华(2002)同样明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仍然采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个人是理性的,通过接受外界信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达到最大化的目的。第二种观点只看到了修正的一面,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于这种范式是有所修正的。杨燕青和吴佳(1998)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三个假定的批评与改造上,即理性行为假定、完全信息假定、最大化假定。她们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采用的是有限理性,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为正,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或“满意化”这三个假定。徐文燕(1999)认为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来说,其研究方法体现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定的重新界定,这主要是补充了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假定以及机会主义的假定。徐捷和张伟如(2012)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并没有摒弃新古典的分析范式,而是运用交易成本范式发展并完善了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最后一种观点比较极端,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已经完全取代了新古典范式。郑志刚(2002)沿袭某学者的“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②的看法,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已经达到了范式的高度。在批评周业安(2001)的“新制度经济学派采用了‘小样本个案’研究方法”这一看法的基础上,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的理论特色在于交易成本的研究范式,而不是周文所认为的‘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就第二类来说,多数人都意识到了案例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蒋自强和史晋川等(1996)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风格,就是注重研究那些现实世界提出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阐述深奥而又精湛的新制度经济理论。”周业安(2001)进一步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中这种案例研究属于小样本个案式的研究。“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地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周业安坚持认为,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所使用的这种案例研究方法是“小样本个案式研

① 他所提到的法律化方法主要是指产权学派的方法,而不是对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② 转引自郑志刚文章,在作者看来,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目前究竟有没有成为一种范式,还未得到经济学术界的公认。张五常提出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究”。这一论断是否恰当，作者认为还需进一步讨论。秦海（2004）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尤其是诺斯的学说当中特别应用了“以历史为载体”的案例研究方法。不过，他们仅仅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应用了案例研究方法，对于这种案例研究方法并没有展开进一步讨论。

第三类文章主要讨论了生物学方法和认知心理学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近年来的影响。蒋道红（2002）指出：诺斯的制度理论正是全盘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并且频繁使用了“自然选择”和“适应性”等概念性工具。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作者将会在后面展开分析。周业安和赖步连（2005）在其《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一文中简论了认知心理学方法在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应用。他们认为一旦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关注制度演化问题，那么就必须怀疑理性假定。制度实际上是人们认知活动交流的产物，制度研究必须要解释制度起源及其演化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要引入人们的认知模型。由此，诺斯等人应用认知心理学讨论了共享心智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演化问题。接下来周业安和赖步连只是对于诺斯等人所阐释的心智模型的具体理论做了一番转述。但并没有详细说明心理学是如何在其中应用的。

第四类文章是从哲学方法的角度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剖析的。例如，彭涛和魏建（2011）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的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理论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孙圣民和徐晓曼（2008）以及郭艳茹（2010）一致指出，另一位知名人物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陈俊松（2001）和刘元春（2001a）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陈俊松（2001）认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特点之一就在于依然保持着个体功利主义的传统。诺斯虽然不满足于将制度变迁理论完全建立在“经济人”范式的基础之上，但令人遗憾的是，诺斯并没有与“经济人”相对立或并列的行为假设，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无法摆脱从鲁滨逊式的孤立个人出发进行经济分析的窠臼。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视角主要表现在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以及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上。刘元春（2001a）论及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所采用的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特点、原因及其表现。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所应用的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主要表现在：其一，扩展了理性选择的使用范围。其二，对于经济人的完全理性进行了限制。至于采纳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因，他则认为，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必须建立在人类行为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稀缺和竞争前提，因此也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上的。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的采用还跟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渊源有关。关于这种分析视角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体现，刘元春的文章主要提到了三个方面，分别是制度变迁中的组织理论、国家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理论。